

孙中山振兴乡村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镜鉴

云立新 党晓虹

(青岛农业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晚清以来,面对严峻的乡村危机,围绕“中国乡村结构性变革”的各种探讨此起彼伏,却较少从时代高度和统筹发展上立论。孙中山立足振兴中华的宏大格局,将民族复兴与重振乡村通盘考虑,从大力发展农业、改善农民境遇和改良农村组织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振兴乡村的理论创见。文章通过厘清孙中山乡村振兴思想的演进脉络,揭示其内在逻辑,阐明其基本要义。研究表明:孙中山把重振农业作为振兴乡村的逻辑起点,把解放农民作为振兴乡村的逻辑进路,把振兴中华作为振兴乡村的逻辑归宿,明晰了一条从振兴乡村到振兴中华的逻辑主线,使得孙中山振兴乡村思想不仅成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轰轰烈烈乡村建设之滥觞,而且也当下全面推进的乡村振兴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历史镜鉴。

【关键词】重振农业;解放农民;振兴乡村;振兴中华;孙中山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4)06-0120-11

The Inner Logic and Contemporary Mirror of Sun Yat-sen's thought of Revitalizing the Countryside

YUN Lixin DANG Xiaoh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Qingdao 266100)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the face of the severe rural crisis, various discussions around "China's rural structural reform" have been discussed one after another, but less from the height of The Times and overal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grand pattern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China, Sun Yat-sen considered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theoretical ideas about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vigorously developing agriculture, improving farmers' situation and improving rural organizations. By clarifying the evolution context of Sun Yat-sen's rural revitalization thought, this paper reveals its internal logic and clarifies its basic essence. The study found that Sun Yat-sen took the revit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the liberation of farmers as the logical path 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China as the logical destination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He clarified a logical main line from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China, this makes Sun Yat-sen's idea of revitalizing rural areas not only become the beginning of the vigorous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1920s and 1930s, It also provides a historical mirror for the current all-rou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收稿日期】2024-02-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政策变迁研究(1921-2021)”(21BZZ023)

【作者简介】云立新(1968-),男,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孙中山思想研究、乡村振兴与社会政策研究;党晓虹(1975-),女,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乡规民约与乡村治理政策研究。

Key words: revitalizing agriculture; liberating peasants; revitalizing countryside; rejuvenating China; Sun Yat-sen

晚清以来,饱受天灾人祸摧残的农业日渐衰败,使得农民生活困苦不堪,加上外来工商资本的入侵,导致中国乡村社会面临崩溃失序的深重危机。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如何恢复乡村的繁荣和安定成为当时中国的迫切任务。最先提出“振兴中华”口号的孙中山将民族复兴与重振乡村通盘考虑,从大力发展农业、改善农民境遇和改良农村组织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振兴乡村的理论阐述和实践方案。

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孙中山的“三农”思想做了诸多研究,胡波、朱宝琴、邱捷、喻树良、苑书义、尚明轩、郭剑化、李国环、吴恒心、张汉静、汪志国、黎环、郭旭东、张亚光、汪澎、管仕福等学者从微观视角重点探讨了孙中山的农民观、农业思想及农村建设思想^①;陈菁、罗国辉等人基于整体性视角,对孙中山的“三农”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②;潘伟杰、方小年、谢晓鹏等学者则站在批判性继承的高度,将其与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的“三农”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③。以上研究有利于深化对孙中山有关“三农”问题论述的认识理解,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但对于孙中山有关振兴乡村的系统思考及其内在逻辑和当代镜鉴,学界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和回应。因此,本文尝试从振兴乡村与振兴中华的关系视角,剖析孙中山振兴乡村思想的内在逻辑,探讨其对推进当代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乃至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借鉴价值。

一、孙中山振兴乡村思想的时代背景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④。如果说晚清时期的“农业凋敝、农村破败、农民赤贫”^⑤可以归结为频仍的灾害动乱与沉重的赋税负担,那么其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西方列强侵略、国内战乱、自然灾害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演化成“城乡背离化发展态势”^⑥。因此

① 相关研究如胡波:《论孙中山与农民》,《江汉论坛》1992年第6期;喻树良:《孙中山农业经济思想述评》,《经济问题探索》1992年第5期;苑书义:《孙中山设计的农业近代化模式》,《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管仕福:《孙中山农村建设思想述论》,《湖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2期;尚明轩:《孙中山与中国农业近代化》,《学术月刊》1996年第11期;郭剑化:《孙中山农业现代化思想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朱宝琴:《孙中山晚年的农民思想简论》,《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8期;李国环:《孙中山发展农业和振兴实业的经济思想述评》,《安徽史学》2002年第3期;吴恒心:《孙中山农业近代化思想论析》,《中国农史》2002年第3期;张汉静:《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孙中山农业经济思想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4期;汪志国:《孙中山的农业科技思想》,《农业考古》2004年第1期;邱捷:《孙中山与农民问题补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黎环、肖伟:《孙中山与中国农业现代化》,《农业考古》2006年第6期;郭旭东:《孙中山农业思想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6期;张亚光、冯靖玉:《中国近代农业发展的的问题与思路——兼论孙中山的农业思想》,《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汪澎:《论孙中山晚年农民土地思想——以共产国际和苏共的解密档案为中心》,《学术探索》2012年第7期。

② 相关研究如陈菁、高峻:《试述孙中山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思考》,《广州社会科学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罗国辉:《孙中山三农思想评述》,《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③ 相关研究包括潘伟杰、刘陆天:《邓小平对孙中山现代化思想的扬弃》,《理论学习月刊》1995年第7期;方小年、李见顺:《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对孙中山的继承与超越》,《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9期;谢晓鹏:《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与毛泽东农民观之比较》,《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④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⑤ 刘启振、王思明:《自然灾害影响之下的晚清中国农业》,《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⑥ 刘雪松、徐畅:《循名责实: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概念之演进》,《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2期。

“乡村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①,已然“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②。

(一)灾害动乱:晚清乡村危机的直接诱因

在晚清72年的时间里^③,气候变化异常,各种极端天气频频出现,中华大地上旱涝交替,灾年荒年连绵不断。“集中爆发一系列大旱、大涝、大震、大风、大疫等自然灾害,以至形成当代中国科学工作者称之为‘清末宇宙期’的自然灾害群发期,其对于农业生产的打击就更为深重了”^④。研究表明,此时期气候变暖使华北、长江中下游和华南沿海地区出现大面积的干旱^⑤。许多自然灾害不仅波及的地域和范围广,而且造成的后果也十分严重。譬如,清光绪年间发生的“丁戊奇荒”,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北方九省大旱,赤地千里,饥民多达两亿,处处哀鸿遍野,满目凄凉,直接饿死及无力掩埋人畜尸体引致的大瘟疫夺去的人命达1300万,其中山西省损失近1/3的人口,其惨烈程度前所未有。根据对晚清时期清政府蠲缓钱粮情况估算的研究显示:“当时全国每年大约有八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地区收成不足一半,严重者甚至减收7-9成,或者根本就是颗粒无收。”多发的灾情往往导致“庐舍漂没、屋宇倾圮、田禾枯死、土地荒芜、农具散失、禽畜凋零”^⑥。除了天灾频繁袭扰,还有蝗虫、瘟疫等其它灾害轮番上演。况且,“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和饥荒,次生灾害的危害不亚于原生灾害,而且前者蔓延所导致的间接后果往往比直接损失更为严重”^⑦。除了自然灾害外,晚清的农业凋敝还与无处不在的人祸密切相关。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社会动乱频繁,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等各种农民起义或社会冲突此消彼长,几乎没有间断。在连年兵祸和社会动荡的影响之下,不仅导致了农业人口的衰减和土地荒芜,严重抑制了农具改进、良种选育以及耕作技术的创新,而且重创了农业发展之基,使得农业生产力水平持续下降。此外,战乱还使得用于兴修水利、赈济灾民的款项大大缩减,国家粮食调控能力随之下降,逢灾必荒成为常态。

(二)内外压迫:晚清乡村危机的主要根源

秦汉至于明清,国家分摊给农民的负担名目繁多,但基本上由三部分构成,即地租、徭役和人口税。清代田制与田赋前后期不同,总的说前期较轻,后期几倍于前。尽管清代摊丁入亩把历代相沿的丁役银(即人头税)合并到田赋银(即土地税)之中一起征收,但这并不意味着晚清农民负担的降低,尤其是在基层政策执行中,仍对没有土地的农民和产粮地区征税,官吏作弊、征派不均等普遍存在,这些问题使摊丁入亩的成果随时间的推移逐步失去^⑧。晚清时期,自耕农佃农化也日益严重。广大农民不仅承受沉重的苛捐杂税,而且还会遭遇一些新的压榨,苦不堪言。国家在赋税征收过程中还常常巧立名目,勾结豪强巧取豪夺,而地主不仅可以依靠权势不缴纳钱粮赋税,而且将各种负担最后都转嫁到农民身上,或隐匿田亩,或逃避赋税。清代中后期农民起义的增多,与地主阶级大肆兼并土地以及对农民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有着密切关系。以粮食占有量为例,崔晓黎研究表明,清代北方旱作区富裕农户年吃粮可达480斤,而贫苦的农民年吃粮仅150斤,不及富裕农户的1/3。光绪《河内县志》云:“岁多丰稔,而竭其地之所产,不足供土著之食”^⑨。光绪末上蔡一个知县报告辖境“富者日见其贫,贫者不见其富……小贸则无以为生,佣力则雇觅极少”^⑩。宣统初,一个豫籍京官在综述河南情况时说,“自庚子以后,百物踊贵,谋生

① 蒋廷黻:《跋燕先生的论文》,《独立评论》第74号,1933年10月29日。

② 晏阳初:《晏阳初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4页。

③ 关于晚清的时间界定,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指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1912年清帝逊位的72年间。参见姜铎:《洋务运动与晚清政局》,《历史教学》1995年第7期。

④ 夏明方:《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

⑤ 郑斯中:《我国历史时期冷暖年代的干旱型》,《地理研究》1983年第4期。

⑥ 李文海:《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生活》,《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⑦ 刘启振、王思明:《自然灾害影响之下的晚清中国农业》,《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⑧ 李顺明、李济南:《“摊丁入亩”对当前我国财税改革的启示》,《财政史研究》(第九辑),2017:63-71。

⑨ 袁通修、方履荐、吴育纂:《(道光)河内县志》,道光五年刊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⑩ 徐寿兹、学治识端:《上蔡县志》,影印清光绪二十七年刊本,国家图书馆藏,线装,索书号51402。

日艰,游惰日众,富者率流于贫,贫者率流于盗”,等等。晚清时期中小自耕农挣扎在温饱线上,广大佃农挣扎在死亡线上。正如鸦片战争以后河南农民愤怒地呼喊:“吃没有吃,穿没有穿,日子过得难睁眼!不如拼上老命去随捻!”咸、同年间此起彼伏的捻军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贫困的逼迫。

此外,处于内忧外患的晚清中国,农民还受到了不同于其他历史王朝新的盘剥。一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晚清政府以自强为名,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很多地方纷纷兴办了各种军工企业,大规模改编和训练近代化的新式海陆军队。这些举措让清政府的开支大幅度增加,产生的各类费用最后还是多摊派到了农民头上,进一步加重他们的赋税负担。据1911年的相关调查统计,地租剥削在“有的地区甚至达到敲骨吸髓的地步”^①。更有甚者,几次对外战争惨败之后那些堪称天文数字的巨额赔款最终也加在早已不堪重负的贫苦农民身上。二是晚清国门被迫洞开以后,国外的农副产品强势进入中国,外来的小麦、稻米、玉米等粮食作物和棉花占据了晚清农产品市场的主要份额,对中国农民形成前所未有的压力。由于自然经济本身缺乏相应的规模效应,再加上晚清乡村整体闭塞,交通运输条件十分落后,致使广大农民辛辛苦苦生产的物品与外国的同类产品相比成本较高,很难形成市场竞争的价格优势,不仅得不到合理的市场对价,还容易被早早淘汰出局。

(三)文化失调:晚清乡村危机的社会因由

中国是自然灾害的多发国,亦称多荒之国或“饥荒的国度”,水、旱、风、雹、霜等灾害常常肆虐。面对自然灾害的威胁,先民们并不是逆来顺受,而是勇敢地应对,提出了“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的荒政思想和措施,维护了国家粮食安全,推动了中华民族薪火相传、文明赓续。然而,到了晚清时期,连绵不断的水旱、瘟疫、兵燹等天灾人祸不仅让农业生产日趋衰败,也让农民生计越发艰难,生活愈加悲惨,使得农民普遍精神萎靡,意志消沉,并对乡村的社会心理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具体而言,一是家园被毁,田地荒芜,农业人口严重流失。当时即使是在普通年景之下,一般农民家庭也仅仅只能维持一个基本的温饱。可是在灾祸或战乱冲击之下,使得本来就已经在勉强度日的农民生活更加不堪,要么流离失所,沦为赤贫,拖家带口外出逃生;要么死于非命。长时期的大面积饥馑困扰造成“三十年之中,虽逢稔岁,从未闻有完全租者。瘠薄之田,竟至白送与人承粮而不肯受。此种情形,推之他省,何莫不然”的后果^②,以至于“在主要农业省份缺地少地的佃户和半佃户占农民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③,这对乡村社会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二是信念沦丧。因为穷困,许多适婚年龄的青年男子找不到配偶,成家立业难于上青天。本来在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影响下,晚清农村许多家庭都不喜欢生养女孩,导致女婴产下不久就可能被溺毙。男女比例的失衡加上生活潦倒,使得本来择偶就难的农村男青年雪上加霜。没有家,岂能有恒心置恒产?更难有什么心思去种田。频发的灾情“摧垮灾区农民恢复生产的决心和信心,他们渐渐怠惰于农事,完全寄希望于逃荒乞讨,甚至形成了顽固的社会风习”^④。由于几无生趣,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在一些地方发生“约计一村之中,向有百人业耕者,今只得五六十人。而此五六十人中,吸食鸦片、惰于农事者,又约有二三十人”的现象^⑤。

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来自国内动荡纷乱的现实情景以及外来西方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不仅使得乡村经济倍受破坏,农民原有的观念风尚也被极大地动摇,造成严重的文化失调,不断销蚀着中国乡村既有的社会根基。

① 李侃、李时岳、李德征等:《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2004年,第417页。

② [清]王邦玺:《缕陈丁漕利弊户口耗伤情形疏》,光绪十年。出自葛士浚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十二,1888年本,第18页。

③ 李侃、李时岳、李德征等:《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2004年,第417页。

④ 刘启振、王思明:《自然灾害影响之下的晚清中国农业》,《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3期。

⑤ [清]王邦玺:《缕陈丁漕利弊户口耗伤情形疏》,光绪十年。出自葛士浚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十二,1888年本,第18页。

上述可见,由于晚清时期的多灾多难以及其他一些破坏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不仅让农业这一传统立国之本变得摇摇欲坠,而且重挫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对生活的信心,从而导致晚清的农村乡土社会奄奄一息,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正是出于对晚清乡村社会面临严峻形势的深刻体察,孙中山将“救乡村”与“救中国”紧密联系,并从挽救农业、解放农民、改善农村等方面入手,提出了一系列振兴乡村的理论创见。

二、孙中山振兴乡村思想的内在逻辑

始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乡村结构性变革”的讨论,在当时尽管都以聚焦农业为中心,但多是“围绕具体农业问题展开的,较少从时代高度和发展的远见上立论”^①。而孙中山的振兴乡村思想并没有囿于农业和乡村范畴,而试图以振兴中华为统揽,将发展农业、振兴乡村放置在促进整个国家实业发展的大格局里来谋划,从总体上统筹谋划如何应对晚清以来中国的生存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一)重振农业:孙中山振兴乡村的逻辑起点

晚清中国依旧是以农业为基、农民为主的乡土社会,因此,如何应对由农业衰败引发的农民破产、进而导致乡村凋敝的总体性危机,以重振农业为中心的路径探讨成为这一时代思潮的主流。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西方思想的不断影响,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走出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思维框限,对如何发展农业有着与过去明显不同的新认知。如张謇提出了立国之本“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所固然”^②。张之洞认为富国之道“不外乎农、工、商三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③。其中,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此问题的思考可谓更加深入和全面系统,准确回答了振兴农村的时代之问。

孙中山出身农家,早年广东翠亨村困窘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记忆。“某也,农家子也,生于畝亩,早知稼穡之艰难”^④。正是儿时亲历的贫寒以及目睹过农民艰辛生计等往昔乡村生活的印记,使得孙中山对当时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实困境有着非同一般的清醒认识,在他脑海里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一个出身贫困的农家子弟,其境遇是否会“终老于是境乎,抑若何而后可脱离此境也”。孙中山认为“实际上及学理上有讲求此问题之必要”^⑤。基于此,孙中山对重振农业的思考也没有仅仅限于农业本身,而是希望通过大力发展农业以改善农民境遇、安定乡村社会。

1. 大力推进农业的科学化

早年海外的求学经历扩展了孙中山发展农业的视野。针对晚清时期农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劳多而获少,民食日艰”^⑥以及对“辨土性、兴水利、除虫害、制肥料等事,惜然不知”^⑦的现实,孙中山力主大力推行农业科学技术,以期“急兴农学,讲求树畜,速其长植,倍其繁衍”^⑧。孙中山指出:“我国自欲行西法以来,唯农政一事未闻仿效,派往外洋肄业学生亦未闻有入农政学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见有一农学之师,此亦筹富强之一憾事也”^⑨。认为应“对数量上占优势的农民灌输新观念”,强调要通过组织农会、翻译西方农学书籍、举办农民知识班以及农业展会和病虫害讲习所等

① 王先明:《中国农村发展理论的百年探索》,《决策探索(下半月)》,2013年第3期。

② 张謇:《张謇全集》第2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3页。

③ 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85页。

④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5页。

⑤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83-384页。

⑥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0页。

⑦ 苑朋欣:《清末农业新政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6页。

⑧ 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2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50页。

⑨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页。

一系列举措,促进农民学习和掌握“科学的道理”^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刚刚建立,孙中山就决定设立各级农业学校、农事试验场、农产统计调查机关和气象测候所等机构,旨在“破旧例愚民抑遏之风,开维新聚众讲求之业”^②。此外,孙中山还希望种茶、养蚕、植麻、植棉和养羊剪毛等农事活动也应当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改良以提升产量和效益。甚至他还曾设想过如何运用科学方法去重新测量全国的农地。

2. 加快发展农业机械化

孙中山针对当时广大农村所用农具“颇欠精良”,整个农业领域生产工具的简陋落后,指出应当设立农器制造厂,采用机器生产制造农业机械设备,发展农业机械化,并就此作了专门解释:“一人所耕,千人食之不尽。因为他不是专用手足,是借机械的力量来帮助人工,自然事半功倍”^③。他期待:“如果用机械来耕田,生产厂至少可以多一倍,费用可减轻十倍或百倍。何来用人工生产,可以养四万万人,若是用机械生产,便可以养八万万人”^④。孙中山认为,农业机械化不仅有利于水利灌溉,变旱田为良田,减少旱涝风险,还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率,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是无疑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即无疑将一国之地广为数国之大也。如此,则民虽增数倍,可无饥谨之忧矣”^⑤。在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上,孙中山一方面强调了中国应立足自力更生来生产农业机具,认为“中国工价甚廉,煤铁亦富,故须自制造一切农器,不必由外国输入”^⑥,以此来降低制造农机的成本。另一方面主张农商一体化发展。孙中山很早就提出“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毕赅”^⑦。“欲谋实业之发达者,非谋其一端则可成效也。必也万般齐发,始能收效”^⑧。后来,孙中山还就如何在适当地点创办诸如制绸工场、缫丝和制丝工场、大型纺织工厂、毛皮工场等各类企业以及食物的储藏及运输、制造及保存等农产品加工做了比较详细的设计。

(二) 解放农民:孙中山振兴乡村思想的逻辑进阶

孙中山认为乡村的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概而言之就是吃饭问题,而吃饭问题的根源则在于土地不均。孙中山之所以把农民问题与吃饭问题链接,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农立国,所以农业就是生产粮食的一件大工业”^⑨,所以他认为吃饭问题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全国人口现在都是不够饭吃,每年饿死的人数大概过千万”^⑩。在他看来,“吃饭问题能够解决,其余问题也就可以随之而解决”^⑪。在《建国大纲》中,孙中山指出:“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⑫进一步地,他认为之所以“中国十八省之土地,现乃无以养四万万人”,就是因为中国农民“有九成都是没有田的”,全国的耕地都被大大小小的地主占有。由于农民一直是在“替地主来耕田”,尽管他们每天起早贪黑,一年到头背朝青天在土地上辛勤耕耘,可最终自己“只能分四成,地主得了六成”,“所生产的农产品大半是被地主夺去了”,而且田赋“都是由农民出”,而农民“得到手的几乎不能够自养”,始终过着饭都吃不饱的悲惨生活”^⑬。显然这对农民来说是一种很不公平的境遇。长此以往,

① 汪志国:《孙中山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思考》,《光明日报》2004年3月16日,第4版。

② 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梁启超按语》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0页。

③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3页。

④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400页。

⑤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1页。

⑥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380页。

⑦ 魏宏运:《孙中山年谱(1866—1925)》,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页。

⑧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122页。

⑨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99页。

⑩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94页。

⑪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国父关于粮食问题的遗教》,1941年,第22—23页。

⑫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6—128页。

⑬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9—350页。

农民的生活只会“日以昂，租税日以重。如此惨状，触目皆是，犹得不谓已频绝境乎”^①，“还有谁人再情愿辛辛苦苦去耕田呢”^②。只有做到把农民“耕出来的农产品要归自己所有”，才能让农民发自内心的愿意去耕田种地，这样“便可以多得生产”^③。鉴于此，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就发现欧洲诸国富强崛起的原因除了“船坚炮利，垒固兵强”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和地尽其利。尤其是“地能尽其利”，孙中山认为这是一条解决农民饥寒的重要途径。所以他特别强调“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脉”^④，主张应当积极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深明致富之大源，在于无遗地利，无失农时”^⑤。对于中国的土地之所以长期以来不能尽其利，孙中山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地权不均，而地权其实是一种民生权，它与国民生计攸关，是重要的民生权利。同时在他眼里，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孙中山宣示：“提出‘民生’二字，为数千年已有之名词至用之于政治经济上，则本总理始，非独中国向无新闻，即在外国亦属罕见”^⑥。所以孙中山指出唯有“平均地权”，才有望解决这一与农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难题。而平均地权的根本目的在于“耕者有其田”。

那么，如何实现“耕者有其田”呢？孙中山认为无非三途。一是实行土地国有，土地买卖不得私相授受。他认为“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即通过革命，变革制度，把满清“官府剥民刮地，暴过虎狼”^⑦的黑暗残民统治，变成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制，然后实行土地国有，才能实现“耕者有其田”。而且还需要“合一县百数十万人民，或数乡村一二万人民，而为一政治及经济性质之合作团体……而此后所有土地之买卖，亦由公家经手，不得私相授受”^⑧。这样不仅可以防止部分地主对土地过分占有，而且可以让每一个劳动者都有田可耕，让“非能耕者不得赁田，直接纳租，不受地主私人之剥削而已”^⑨。二是实行国家保护。国家要“有自由农业法以保护、奖励农民，使其获得己力之结果”^⑩。国家应对农民“有一种鼓励、有一种保障，让农民自己可以多得收成”^⑪，以便充分发挥“中国农人颇长于深耕农业，能使土地生产至最多量”的优势^⑫。他在《实业计划》中写到：要让农民“以获利为第一原则，故凡所规划，皆当严守之”^⑬。具体做法是：“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植荒徼，以均地力”^⑭。三是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他指出：“平均地权者，即井田之遗意也”^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孙中山更是明确把“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作为解决农民问题的两个基本方针，并提出要“清查户口，整理耕地，调正粮食之产销，以谋民食之均足”^⑯。他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假使没有最广大农民的完全解放，革新就只能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空话，而让每个耕作的农民都有田可耕，才能解放广大农民，才是对农村社会最彻底的革

①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5页。

②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99页。

③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400页。

④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0页。

⑤ 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2册·论著(上)，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49页。

⑥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355页。

⑦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5页。

⑧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3-164页。

⑨ 陈红民，方勇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胡汉民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7页。

⑩ 孙中山：《建国方略》，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8页。

⑪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399-400页。

⑫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9-350页。

⑬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273页。

⑭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120页。

⑮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193页。

⑯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4页。

命”^①，同样也点明了振兴乡村的正道所在。

（三）振兴中华：孙中山振兴乡村思想的逻辑归宿

作为最早提出振兴中华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痛感晚清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备受屈辱的境况，决不相信中国曾经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所处的地位比现在的列强像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还要高很多”^②，怎么会就此沉沦下去。所以他坚定抱持“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③的信念，立足于振兴中华的宏大目标，对解决中国乡村的总体性危机进行全面擘画。鉴于晚清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以及全国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的实际，农村社会可以说是整个国家的基础。如果农村凋敝的状况得不到改变，振兴中华也就无从谈起。“解决农民问题，安定农业经济，为中国一切问题当中的第一个重要问题”^④。振兴中华当然成为孙中山振兴乡村思想的逻辑归宿。

1. 发展农业、振兴农村是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孙中山不仅把农业农村的兴衰看作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是中国对标当时西方先进国家，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化以实现振兴中华理想的关键^⑤。如果从振兴乡村的角度理解现代化在当时中国的内涵，实质上就是希望通过学习和总结同时期世界文明进化的经验，以现代性不断激活中国乡土社会，促进中国由古代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变。就此而言，孙中山有关振兴乡村的很多言行都与现代化的旨趣高度契合。早在他的《上李鸿章书》一文中，孙中山就曾提出借鉴西方先进国家的做法，纵论大力发展农业是“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⑥，阐明“农桑之大政，为生民命脉之所关”^⑦。他在其《实业计划》里明确指出：“农、矿二业，实为其他种种事业之母也。农、矿一兴，则凡百事业由之兴矣。”^⑧不仅重申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基础地位，并且强调促进产业兴旺是农业农村发展的核心，充分显示了孙中山对这一问题认识所具有的前瞻高度和全局视野。

2. 远见卓识，以振兴中华统摄振兴乡村

孙中山针对“我们国家的土地有这样大，矿藏有这样富，农产有这样多，为什么还弄到民穷财尽，人民日日受贫穷的痛苦”^⑨的现状，他最初对振兴中华道路的设想是后进学习先进，即中国“可依西方已辟之路径而行之”^⑩。孙中山甚至以为，只要中国取西方成功之捷径，借鉴西方成功之经验，秉持“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的态度，假以时日，就一定会“后来居上”，成为世界上的“头一等强国”^⑪。然而，衰败的农业、穷困的农民和凋敝的农村促使孙中山开始反思，如果不能解放农民，就无法挽救濒于崩溃的乡村社会，那么有关实现“民族的再造”和“国家的强大”，只能是纸上蓝图，无从落实。也许是在思考如何才能让包括农民在内的不同社会阶级各得其所、各安其业的过程中，孙中山开始逐渐认识到：“我们立志，还要合乎中国国情。”^⑫但如何才能从自身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振兴中华之路，孙中山

①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127页。

② 黄彦主编：《孙文选集》中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8页。

③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53页。

④ 文公直：《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三民书局，1929年，第33页。

⑤ 尽管在“孙中山的文本语录里没有‘现代化’这个词是自然不过的事……但并不等于他没有‘现代化’的思想意识表达。”见廖大伟：《孙中山对中国实现现代化道路的思考与选择》，《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2期。

⑥ 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二册·论著（上），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46页。

⑦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18页。

⑧ 《总理全集第一集（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第1016-1017页。

⑨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56页。

⑩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25页。

⑪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253页。

⑫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538页。

认为必须借助“远大之眼光,内则考出中国数千年之积弊,外则察西洋各国之兴旺盛衰及其理由,以图挽救之方”^①,才可能避免重蹈西方失败的曲折,省却许多冤枉工夫,收事半功倍之效果^②。进而超越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为此,他敏锐指出:“中国今日苟欲图强,必先致富,其次在均富”^③。并且针对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农民为主的国家 and 当时面临的农业一蹶不振、农民水深火热和乡村残破不堪的困境,孙中山提出应当通过“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徐谋地主佃户间地位之平等”^④,才能有望为实现“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⑤打下基础。这一点与今天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中的“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目标高度契合。

3. 唤醒农民,担负振兴中华的责任

孙中山把向农民宣传“三民主义”纲领,促进现代新思想、新事物流布乡村社会作为振兴乡村的重要路径。其目的很明确:通过向农民宣传“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主权在民”“耕者有其田”等思想,启发他们产生新的觉悟,即“就是要一般农民不要有从前的旧思想,要有国家的新思想;有了国家的新思想,才可以脱离旧痛苦。要一般农民都有新思想,都能够自己来救自己的痛苦,还是要农民自己先有觉悟”^⑥。同时,孙中山觉得只有让农民明白他们在这个国家中享有什么样的地位,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权益,才能真正激发农民为民族争独立、为国家谋富强的愿望,才能承担起振兴中华的责任。所以他要求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宣传人员到乡村去宣讲“三民主义”时,一定要讲清楚“农民本体有什么利益,国家有什么利益,农民负起责任来把国家整顿好了,国家对于农民又有什么利益,然后农民才容易感觉,才有兴味来管国事”^⑦。

三、孙中山振兴乡村思想的当代镜鉴

孙中山立足振兴中华,对振兴乡村进行系统、全面的设计思考,其思想源流不仅可以追溯至全球“乡村世界主义”(Rural Cosmopolitanism)^⑧的发轫,而且也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轰轰烈烈开展的乡村建设之理论基础的滥觞。因此,如果把孙中山有关农业、乡村和农民的诸多论断和思考仅仅只是定格或悬置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研究,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学术态度。而是应当放宽历史的视界,深入梳理归纳孙中山振兴乡村思想,以百年来的时间跨度重新审视和挖掘蕴藏其中的理论创见,探讨对当下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借鉴价值。

孙中山的振兴乡村思想连接了拯救凋敝乡村与促进民族复兴之间的逻辑纽带,也因此清晰梳理了如何从振兴乡村走向振兴中华的演进之路,既为百年来有志于振兴中国乡村社会的后继者指引了路向,也为今日中国的乡村振兴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现实观照和重要借鉴。环顾当下,保障粮食安全、端牢中国人的饭碗依然是主流话语的高频词,同时在人口急速老龄化、低生育率等新的时代背景下,正在全面推进的乡村振兴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因此,如何在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回望百年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之路,对孙中山振兴乡村思想的内在逻辑予以梳理与探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 首发农业农村现代化事关民族复兴的先声

如果拿一个理论体系的标准去衡量孙中山的振兴乡村思想,它的严谨完备性尚显不足,但这并不影

①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30页。

② 郑淑芬:《孙中山实业救国思想简论》,《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4期。

③ 孙中山:《国父全集》第4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79页。

④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4页。

⑤ 孙中山:《女子要明白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56页。

⑥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555页。

⑦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555页。

⑧ 王果:《从乡村建设现代中国》,《读书》2019年第10期。

响其思想的睿智深邃,尤其是这一思想当中展现出的超前而又独到的问题意识不仅没有湮没在岁月的长河里,时至今日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纵观孙中山的振兴乡村思想,无论是“以农为经”大力发展农业,还是推动“耕者有其田”以增强农民的国家主人翁意识等系统性论断和思考,其最终的目标指向就是振兴中华,也因此凸显了这一思想不仅只是用以破解晚清以来农业衰败、农村凋敝和农民穷困等总体性危机的应急策略,而是深刻触及了农业农村现代化事关民族复兴这一关键命题。即使将其置于100多年的时间跨度,仍然难掩其思想光芒。毫不夸张地说,孙中山期望通过发展农业、解放农民以及改变乡村社会的一系列整体设计,探寻出一条从振兴乡村走向振兴中华的发展路径,其中蕴涵的深谋远虑大大超越了那些“只从纸面上着想,不从根本上主张”^①的同时代其他理念,尤其是他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体认,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相关经验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时,常常通过选择性的斟酌和“规抚”以完成新的“创获”的做法,对于今天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具有重要的启迪。

(二) 强调农民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体性力量

柏金斯认为:“中国的现在是中国过去的延续,中国的历史依然映照中国的今天,‘过去’的影子可以见诸众多方面。”^②试想孙中山所处的那个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时代,国人几乎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习惯于把自己看作是清王朝的子民。同时由于农业衰败,使得农村作为整个国家的基础几无生机。就是这样一种历史环境,孙中山却站在了时代的高点,为贫困破败的乡村和生活穷苦的农民谋划新的出路。孙中山的着眼处则是农民,是如何通过进一步动员和依靠农民的力量以振兴乡村。无论是孙中山从同盟会时代强调平均地权,还是直至最后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他始终把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视为发展农业、解放农民、振兴乡村的前提和首要条件,并且把变革旧的生产关系作为根本手段,目的在于解放农民,可谓切中了振兴乡村的要害。孙中山当年思考的许多问题依然具有现实观照,如何“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③,仍然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 保障农民合法权益、激发农民内源性动力是振兴乡村的关键

毋庸置疑,由于难以避免的时代与阶级局限性,孙中山无力对当时的封建土地制度进行彻底变革,他所提出的“平均地权”方案也未能真正解决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农民的根本权益也没有获得保障,致使孙中山希望通过解放农民并将其改造成一支推动中国从振兴乡村走向振兴中华重要力量的宏大构想终成遗憾,无法变成现实。这一历史任务最终落到了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并且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作为治理型政党,中国共产党通过凝聚政治力量、构建制度支撑、再造村社组织、重塑文化认同、挖掘优势潜能等手段在内的政策治理和法律治理^④,不仅使得中国的农业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亿万农民也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进入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尤其是当前,我国早已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且开启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然而,正如“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⑤,同样,没有乡村的振兴就不可能有民族的复兴,所以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农村和谐依然关系到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顺利进行。事实上,尽管100多年过去了,但如何通过改造农民,再造乡村,从乡村建设现代中国,以建设现代国家的探讨仍然在继续。鉴于“‘三农’问题

① 周鼎华:《农村复兴与农村教育》,《大夏》1933年第4期。

② 李伯重:《“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③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59页。

④ 陈尧:《发展与秩序: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治理与法律治理》,《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1期。

⑤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2页。

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增进利益和保障权益问题”^①,因此,如何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尤其是如何“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②,仍然是百年未尽之大课题。

结 语

乡村破败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城市工业化造成的国际经济危机^③,事实上,“随着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城市和工人等现代文明因素的出现,与传统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便构成了社会和政治问题”^④。因此,如何恢复乡村的安宁、促进繁荣,在100多年前就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之问。而具体到中国,“‘三农’问题虽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从根本上说则是一个历史问题”^⑤。而孙中山的振兴乡村思想,产生于晚清以来中国农村工业、手工业发育不良并且缺乏充分城市化的时代环境中,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代志士仁人对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苦苦思索和艰辛探寻,已然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要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

不可否认,当前我国“三农”领域仍然面临“空心化”的乡村、农户的“小、散、乱、弱”以及传统村落不断瓦解等诸多困境。因此,聚焦这些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是引发孙中山振兴乡村思想研究的现实动因。本文通过辨析史料,探讨孙中山振兴乡村思想的内在逻辑,梳理从振兴乡村走向振兴中华的逻辑线索,目的在于以求真严谨的态度和新的视角“去描述话语与行动之间的历史性与实践性关联”^⑥,在于“回观历史,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加以审视,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认清其时代特征”^⑦,从而厘清相关问题,借鉴经验,以期对分析制约当前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困扰,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所裨益。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⑧,同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⑨。这就需要本着科学态度,聚焦孙中山乡村振兴思想的内在逻辑,特别是关注孙中山如何立足对国情的深入勘察与洞察,为中国乡村谋划一条“通往现代的中国道路”,目的在于今天更好地处理农民获利与集体收益之间的关系,平衡致富与均富以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发挥其历史资鉴作用。同时,进行孙中山乡村振兴思想内在逻辑的分析,应当尽可能扩展史料收集的范围并仔细甄别,努力避免在论证过程中出现臆测的倾向,不仅有助于厘清孙中山乡村振兴思想逻辑演进的脉络或主线,而且可以“检讨已有的成果,知其缺点与不足之所在,冀有所突破与发展”^⑩。下一步,不仅应当探寻孙中山振兴乡村思想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之间的联系,而且应当关注孙中山振兴乡村思想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政策变迁的影响,以此构建更为开放性的阐释框架,将更多真知灼见纳入视野并开展比较研究,不断深化对孙中山振兴乡村思想的逻辑线索及其演变轨迹的认知,从而起到温故知新的作用,让我们的后见之明能够建立在百年乡村发展实践的历史和事实基础之上,为新时代高质量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责任编辑:李良木)

①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02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40页。

③ 王果:《从乡村建设现代中国》,《读书》2019年第10期。

④ 徐勇,徐增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⑤ 王先明:《百年中国乡村发展理论论争的历史思考》,《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

⑥ 章永乐:《重审辛亥革命中的南北议和》,《清史研究》2023年第1期。

⑦ 王先明:《百年中国乡村发展理论论争的历史思考》,《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

⑧ 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求是》2023年第16期。

⑨ 杨颜菲等:《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民日报》2024年3月5日第9版。

⑩ 汪荣祖:《史学九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20页。